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

周 明 鹏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精神生产是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作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是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能动反映,直接关系着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满足、精神素养提升、心灵世界滋养以及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物质前提,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追求,生动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贯彻与发展。深入探究和科学证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具体内容、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有利于基于精神生产维度,科学探索促进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3-0014-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30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历史演进规律和发展大势,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升华了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目标以及价值的认识,战略性、前瞻性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501}。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无法脱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精神生产力的充分释放。换句话说,人民群众昂扬的精神状态、充盈的精神世界、崇高的精神境界、丰富的精神享受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精神生产提质升级和精神资源有效供给的基础之上。

通过对现有学术文献的梳理、归纳与总结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基于多元化视角、多样化思路和多维化方法,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主要围绕概念界定、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困境审视、衡量指标以及推进路径等维度展开深入探究。例如,李建国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优质精神文化资源在全体人民中的共建共享^[2]。王丰认为,应以“五个文明”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构建遵循基本内涵、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际、能够进行地区差异化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评价指标体系^[3]。还有部分学者依据不同的专业范畴,分别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之维、文化之维、道德之维进行细致阐释,业已形成较为丰硕的、葆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例如,王瑜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葆有十分深厚的伦理意蕴,确证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道义合理性^[4]。值

收稿日期:2024-05-28

作者简介:周明鹏(1996—),男,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0后’大学生美好生活观的样态、形成及培育研究”(21BKS055)。

得注意的是,学界也格外重视从人的本质学说、共同富裕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层层递进地阐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源泉,取得了一些有益成果。但是,理论探寻的系统性、深入性、整体性稍显薄弱与不足,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在联系的全面性研究。由是观之,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唯物史观视域之下精神生产的实质,从精神生产角度探索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思想源流与理论考证

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从“物”的视角探寻了精神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德国古典哲学从“人”的视角将精神生产理解为人的特有的生命活动,二者对于相关范畴的初步阐释与合理探讨,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启发和理论借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的基础之上,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葆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思想源流

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实践活动,精神生产这个范畴的研究历史较为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于精神生产的性质、类别、功能等维度进行了诸多探讨。例如,柏拉图特别聚焦心灵在伦理上的独特作用,在理性认知的引导之下,以灵魂的力量实现对美和善的自我观照。在其中期作品《会饮篇》中借助其师苏格拉底与虚构的女先知狄奥提玛的对话,阐释了“心灵生殖力”,指出“有一些人的灵魂比他们的身体更有生育能力,更适宜在灵魂中播种、怀孕和生养。适宜生养的是什么呢?智慧以及其他美德”^{[5]741}。质言之,柏拉图在这里注重澄明灵魂生殖出智慧、美德对城邦以及家庭秩序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狭小的人类实践空间以及个体有限的认知能力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这一时期哲学家们对于精神生产的认识与思考较为粗浅和零散,局限于具体现象的片面解读,并未上升到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建构。但是对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生成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我们注意到,对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生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亚当·斯密、施托尔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精神生产理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6]178}的亚当·斯密超越了片面的重商学派和极端化的重农学派,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这一理论贡献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但是,亚当·斯密劳动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否认精神劳动的生产力,认为精神生产属于非生产性劳动。李斯特在批驳亚当·斯密忽视精神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建构起自己的精神生产理论。李斯特不仅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提出并明确使用“精神生产”这一范畴,而且阐释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精神生产者的成就愈大,物质财富的产量也就愈大,反之亦然,即物质生产者生产得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得到推进。除此之外,李斯特认为,国家发展取决于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共同建构的生产力总和,二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平衡和协调,“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7]140}。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系统且深入地考察与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由于其不了解精神生产葆有的社会性、历史性、主体性等鲜明特质,致使考辨陷入片面且肤浅、抽象且静态、简单且庸俗的泥淖之中。

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生产理论。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人的主观世界和精神生活。例如,康德从认识论角度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人在认识活动

中理性的主体能动作用,生动表征为个体在感性直观认识中能动地将杂多感觉以时空形式综合起来,在知性认识过程中以纯粹知性范畴能动地将零散孤立的感性材料联结统一,以及在理性认识阶段以思维中最高统一体的追求即“范导”能动地引导知性。我们注意到,虽然康德的这一贡献确实夸大了主体作用,并呈现出先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明显局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对于马克思高度关注现实个体在精神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哲学影响。黑格尔较为关注精神生产的真正价值,关注到精神生产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并试图阐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生产理论受到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的影响与制约,认为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俱是“绝对精神”确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外显形式,本质上是“绝对理念”的对象化,现实的人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的工具,而非精神生产的主体。费尔巴哈对于精神生产的思考基于唯物主义立场和存在决定思维的原则,批判了黑格尔将精神生产活动与现实的个人相分离,认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现实的个人是精神生产的主体而非“绝对精神”,因而精神生产具有满足主体内在需求的自主性、创造性和非连续性等特征。除此之外,费尔巴哈认为精神生产区别于以消费、实用为追求的物质生产,是以欣赏、审美为目的,葆有享受性特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费尔巴哈关于精神生产理论的论述呈现出明显的人本主义特征,所伸张的精神生产主体是脱离感性世界、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历史进程的抽象的生物本体。综上所述,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不仅仅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和渗透,更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精神生产理论为直接思想来源,是在批判继承其他古典哲学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生成和进一步发展的。

(二) 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理论考证

通过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诸多经典著作,我们不难发现,“精神生产”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之中。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已经从人的类本质和社会实践的维度出发,探讨了精神生产,批判了古典经济学以“物”的角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以抽象的、片面的、绝对的角度理解精神生产,认为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生产劳动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凝练形成了人本主义精神生产思想,精神生产理论初见雏形。这一时期,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有关精神生产范畴之于古典经济学家和黑格尔虽然有所突破,但是依旧尚不完善和成熟。之后,马克思基于实践唯物主义,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不了解社会实践、对人的抽象理解两大缺陷,对于精神生产的含义、原始发生、历史演变、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等相关范畴展开深入且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又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精神生产特点,更进一步地集中论述精神生产性质、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原理,丰富和完善了精神生产理论。

其一,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构成。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诸多经典著作中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即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生产并非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而是一种广义的、全面的生产理论。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片面的、无意识的、在肉体需要支配下的动物生产与全面的、自由自觉的、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人的真正生产对立起来,认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8]57}。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进一步审思和探寻了精神生产的产生、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属性等问题,认为“想象、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8]151}。概括而言,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中既包括了决定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又广泛地涵盖了作为其他各种生产基础的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关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生产。

其二,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物质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准确把握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从物质形式与社会形式的双重角度厘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范畴。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8]158},“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2}。换句话说,精神生产的来源、性质、历史形

式演变等从一开始就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和支配,反映着物质生产规律。现实个体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累积着思想、情感、道德、交往、审美等诸多能力,这些蕴藏着精神活动得以生成的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擢升,物质生产的持续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形成和扩大,精神生产能够逐渐从社会生活整体之中分化脱离出来,挣脱纯粹的劳动意识范畴,具有更加突出的规模性、直接性以及相对独立性,作用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例如,科学技术作为精神生产的产物之一,最为直接也最为显著地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以及精神生产本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三,精神生产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8]152},鲜明回答了人是精神生产实践的主体。不容置辩地说,马克思对于精神生产主体即人的阐述,根本上异质于黑格尔绝对精神下的理性的人和费尔巴哈对于人的本质纯粹自然意义的感性直观的理解,是基于实践活动的场域,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考察和把握人的本质,锚定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确证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因此,一方面,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的且具备一定能力和素养的人。马克思从现实个体的角度出发,科学指明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能动实现自我的手段,既张扬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又认为实践也会受到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故而,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样态,精神生产是人类所特有的、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的且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意味着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主体可以根据自身审美等各种需要,自主地、有目的地、能动性地开展精神生产实践。另一方面,精神生产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精神生产能够创造出高品质、多样化的精神资料,对标和满足现实个体的多维基本需要,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能够在精神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得到确证。

其四,精神生产葆有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之中,一般的精神生产不再直接表现为意识形态,而是一定社会形态下非统治阶级、独立的自由精神生产和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实践的有机统一,统治阶级绝对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也必然隶属于这个阶级。除此之外,无论何种形式的精神生产活动,总是由具有社会属性的、现实的个体在特定的客观社会环境之中铺展开来,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约束或规制,主客双重维度确证精神生产无法避免地葆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统治阶级将会以精神生产为载体,“将其意识形态理念包装成独立于一定阶级利益的、具有社会普遍公正性、自然性的观念体系,并将现存的社会格局幻化为一种最为理想的生活状态”^[9],为现存统治秩序和统治格局寻求合法性依据。不仅如此,统治阶级也注重以自己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为标准,选择、剪裁其他精神生产内容,将统治阶级的意志延伸至文化生活领域,并尽可能地促进负载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空间的广泛且深入地传播,试图以教化职能建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实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

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物质前提,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追求,生动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贯彻与发展。

(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特殊的认识活动,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满足现实个体的精神需求和推动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以拜物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性超越,根本上摆脱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宰制,将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共同富裕作为内在规定、本质特征以及价值追求,鲜明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精神生产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些维度呢?立足于超越性和创新性视域来看,西方以资本为中心逻辑的现代化图式内藏着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基本矛盾,从而表征出物质主义极度膨胀、精神价值缺失、两极分化严重、背离人的本质等明显缺陷^[10]。除此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受制和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具有突出的逐利本性和扩张本质,为了掠夺资源和占据市场,不惜采取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围剿等手段展开恶性竞争,导致全球范围内衍生出经济危机频发、生态环境破坏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众多正义困境。与之截然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和精神禀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以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趣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模式。要言之,基于国内视野,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逻辑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着力提升社会文明水平。基于全球视野,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矫正“普世价值论”,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所谓“西方中心论”,以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超越所谓“历史终结论”,以文明交流互鉴解蔽“文明冲突论”。

以丰盈充实人民群众精神世界为核心要义、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有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找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沉着应对与化解各项风险与挑战,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新的恢宏图景,深度彰显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除此之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细照笃行中走深走实,化解人民群众在价值塑造、精神提升等领域可能出现的困境;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高度繁荣、蓬勃发展,加快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升文化整合引领能力,推动文化的广泛传播与深度融合,促进文化交往与互鉴,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助推物质文明建设,实现二者同步积累、协同发展和有机统一。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高质量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

通过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剖析与解读,我们深刻认识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互涵指、共轭一致、不可割裂和偏废,二者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中。物质生活需要是人民群众先在性基本需要,理性平和的心理生活、意义丰盈的文化生活、崇高深邃的信仰生活等精神生活内容必须建基于发达的、扎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因此,只有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整把握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效破解发展难题,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解决好当前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不协调问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高品质的精神生活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促进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改变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提升,厚植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脱贫攻坚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承继和发展百余年宏伟实践凝练形成的中国化反贫困理论成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符合中国国情、葆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道路,构建起以明确的责任体系、多元的投入体系、科学的实施体系、专业的考核体系以及完善的监督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扶贫脱贫机制体系,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以消除绝对贫困。新时代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极大促进了贫困地区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等事业的显著发展,带动了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融合发展、转型升级,以及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极大保障和有力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层次目标。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

和人民的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11]高质量社会建设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效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优质高效、公平公正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多层次、立体化、动态调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回应、聚焦、反映以及满足民生需求,增进民生福祉;生态环境的深刻变革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稳定、和谐、绿色的生产生活环境,等等。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藏着鲜明的人民逻辑

透过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中对于人的本质的考察,进一步明确了现实个体在精神生产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和发挥的能动性作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积极敞开对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注,依托于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饱含着对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人民逻辑的贯彻与落实。

首先,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逻辑起点。人民群众需要的阶段性动态演变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得到极大释放,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优化促进物质生产种类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样、质量更加优异。因此,人民群众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生存性物质需求,而是追求高品质享受性、发展性物质需求满足。并在此基础上,转向追求社会安全、公平正义、福利供给、生态和谐、审美情趣、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多元丰富的美好生活需要,热衷于思想共振、情感共鸣、价值共识的精神交往和心情欢愉、热情饱满、道德高尚、信仰坚定的精神生活状态。作为美好生活的精神维度和应有之义,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高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品质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12],在广泛的精神参与和精神交往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层次和价值意境,建构更富内涵的道德秩序和思想认知,塑造更加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精神操守。

其次,以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关键要义。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指明了人的现实性、社会性、能动性、实践性、革命性等特征,创造性地锚定了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确证了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人民群众既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享用者,也是优质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以及丰富的精神服务的生产创造主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3]¹⁴²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语境之下,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精品文化生产创造、文化产业创新升级、精神文化空间优化拓展,抑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等等,均依靠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释放劳动热情,激发内在葆有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以实干创造成绩、以共同奋斗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最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唯物史观视域之下,人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且从事着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体。其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自由时间的大量增多,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基础之上的劳动能力、社会关系、多层次需求、自由个性等方面的发展。回归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场域之中,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聚焦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通过改善发展环境、满足发展需求、提升发展层次、强化发展保障以及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等举措促进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是观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内在统一^[1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以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样化、多重性精神需要为实质性内涵,通过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着力提升建设质量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筑牢意义丰盈、崇高笃行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三、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指导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价值

当前,多元协同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满足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精神风貌澄明向善、民族精

神力量自信自强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葆有旺盛的现实生命力和雄厚的时代解释力,能够补裨我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全新的高度探究新时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路径。

(一) 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生产,夯实精神生活思想基础

通过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深入解读,我们发现在物质生产实践的统摄之下,“意识形态生产是阶级社会中反映阶级意识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特殊精神生产”^[15],通过价值导向型知识协同生产、话语体系建构、社会权力生产等路径,达到维护和实现特定阶级利益的最终目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既具有深刻的实践向度,又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的术语”^[16]²,本质上是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和恩格斯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一是基于生活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生活的认识,指出作为思想或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一般”,表征出没有历史的非独立性属性,并不能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真正动力;二是作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过程中的延伸物,“意识形态具体”往往能够借助于一定的外在形式而独立存在,形塑着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道德修养、精神品质以及生命信仰,又成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构成因素,葆有阶级意识属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导向,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优化,展开具有感召力、说服力、渗透力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纠正各种错误认识倾向、批驳各种错误思潮,在增进人民群众情感认同、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度聚焦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洞察国内与国际形势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化,从战略维度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确保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质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且通过顶层设计和精准施策提升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效能,促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7]¹⁰。

新时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潜隐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不容忽视。例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隐蔽渗透将会冲击和消解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互联网等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其所具有的公开性、匿名性、难控性等突出特征极易模糊事件真相、制造虚假有害信息、传播落后思想,影响着人民群众做出正确的善恶判断和曲直剖析,等等。在此意义上,探索以主流意识形态生产筑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根基和思想基础,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站稳人民立场,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以葆有思想深度、价值高度、情感温度的精神文化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以期防止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扰乱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秩序,有效抑制物欲享受、拜金主义、娱乐至上等错误思想倾向污染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具言之,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根本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赋予主流意识形态新的内容,巩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戳破和拆穿所谓“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荒诞主张的工具性本质和真实图谋。二是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促进人民群众确立和坚守理想信念,把牢思想“总开关”。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常态化指涉的是教育实践的稳定性、日常性和长期性,制度化侧重于教育实践的规律性、规范性和系统性。立足于精神生产维度,理想信念教育内容资源的深入挖掘和实践资源的充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融通,促进人民群众在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体悟和坚守。例如,既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来源、文化根脉以及实践基础,以符合时代要求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澄明其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深入挖掘其中蕴存的真理力量、思想力量、文化力量以及人民的力量;又从实践空间运用好各种类型的红色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呈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的展览馆等育人资源,合力共谋促进理想信念教育。

(二)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构筑精神生活价值高地

作为新时代精神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

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8]33}。秉本执要地说,理论精深、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基本立场,充分汲取了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精神、人文情怀的哲学精神、内敛淳朴的道德精神、担当道义的责任精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深厚滋养。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表达,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指南和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遵循。进一步说,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一方面有利于遵循共同富裕的内在规定性和现实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促进物质层面富足与精神层面富有的协调发展,构建美德良善的和谐社会图景,助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和满足人民群众现实性与超越性相融通的美好生活期待;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塑现实个体的健全人格和涵养美好生活的德性伦理,促进人民群众在情感上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产生强烈共鸣,形成价值共识、理念肯认和精神笃信,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志向和实践动力,从而激发和凝聚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强大内生力量。

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从内容生产体系、话语表达体系以及话语传播体系三个维度联袂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其一,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解读和学理阐释,建构大众化与形象化并存的内容体系,引领人民群众形成理性认同。现实个体葆有科学、深刻、全面且透彻的理性认知,有助于形成对于客观事物正确的判断、明确的价值观点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而这种认知只有建基于理论的彻底性之上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支配力。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内涵解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机理充分结合起来,运用其本身所涵存的学理资源、哲学思维和逻辑支撑,促进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内容通俗平实、形象具体地展示在社会成员面前,服务于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其二,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意蕴和精神品格挖掘,建构时代性与精准性并存的表达体系,引领人民群众形成情感认同。作为一种表意实践,话语表达本质上指涉的是一种言说范式,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内容进行提炼、转译和优化,创设与更新贴合时代语境和人民需要的话语表达体系。具言之,在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契合程度的基础上,既注重有效整合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又注重由纯粹的文本描述话语转换为生动的实践话语,在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引领力的同时,唤起人民群众对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由广泛认知跃迁至情感认同和思想共识。其三,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转化与实践引导,建构广泛性与交互性并存的传播体系,引领人民群众形成行为认同。当前,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娱乐消费等成为人民群众满足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注意到,网络信息传播在呈现出全员参与、全息融合、全效精准等突出特征的同时,还可能存在着内容生产碎片化、传播主体多样化、舆论生态复杂化等不容小觑的多重挑战。因此,既要强化主流媒体和其他网络传播主体的政治责任感,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空间和交流场域,又要以法治思维和道德思维推进网络空间生态环境治理,促进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中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主体自觉的具体行动。

(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唤醒精神生活力量源泉

根据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文化作为现实个体精神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由是观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源自映显民族特质、奥义精深、包容有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彰显共产党人理想远大、使命崇高、信仰坚定的革命文化和凸显时代使命、立破并举、激浊扬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如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呢?我们应该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前沿和战略高度,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局面和文化建设新风尚,奠定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软

实力^[19]。一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基因。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0]24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葆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革故鼎新的文化气质与知行合一的文化品格。因此,顺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坚持“两个结合”,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总体性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与形式创新,赋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刻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激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认同和独立精神。二是弘扬革命文化以固本培元和塑魂立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精神标识,革命文化的孕育生成、传承发展与创新转换贯穿于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众志成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以及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四个显著不同的时空场域之中,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先进纯洁的政治底色以及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以革命文化中蕴存的红色基因、精神禀赋和文化结晶等精神钙质涵养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建构能够引起人民群众广泛肯认与情感共振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在错综复杂和激烈碰撞的文化思潮中正本清源、净化灵魂、强化共识、凝聚力量。三是强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生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潮流,在继承创新中淬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应时处变中升华革命文化,在博采众长中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深刻标注了自身的历史方位、文化性质以及时代内涵,葆有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以及包容性等突出特征^[21]。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利于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中促进文化创新,提升文化竞争力和意识形态引领力,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明方向和注入动力。

结 语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精神生产的特点,揭示了精神生产的本质内涵、原始发生、历史演变、与社会生产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确证了精神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作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全新的概念话语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自觉、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自觉以及关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未来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之下,与时俱进地全面解读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拓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科学的思维、全新的视野探索新时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桥梁、理论根基与精神纽带,为构建具体实践路径提供有力支撑。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李建国,严春蓉. 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意涵及其实践路径[J]. 科学社会主义,2022(04):18-26.
- [3] 王丰.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6):35-51.
- [4] 王瑜.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向度及价值意蕴[J]. 道德与文明,2023(06):13-23.
- [5]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上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王延华. 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意识形态嬗变[J]. 湖北社会科学,2012(02):11-13.
- [10] 孟东方,江优优. 中国式现代化指数构建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5-20.

- [11] 孟东方,王资博.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研究论纲[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5-15.
- [12] 黄意武. 新时代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显著优势[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5):136-147.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4] 宋岛馨,毕红梅. 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人民逻辑[J]. 社会主义研究,2023(05):26-32.
- [15] 寇清杰,肖影慧.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生产的三重逻辑及经验启示[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4):21-34.
- [16] 张秀琴.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9] 周明鹏,金昕.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2023(11):29-40.
- [2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1] 刘富胜,宋豫,李琰. “两个确立”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2):21-28.

Research on Marx's The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Zhou Mingpe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2, China)

Abstract: Spiritual production is a key component of Marx's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Marx's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As a practical activity of real people, spiritual production is an active reflec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 under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huma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the improvement of spiritual literac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due meaning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in the new era tak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material premise, adheres to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people first, actively responds to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fundamental pursuit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which vividly reflect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s spiritual production theory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and scientifically clarify the specific content, development laws,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s the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explore specific paths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spiritual life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Keywords: Marxist the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陈忻]